

韩少功 阅读的年轮 《米兰·昆德拉之轻》及其他

所有地上发生的事情已经被重写成百上千次了，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去验证实际上发生的事情。人类的历史反复被重写，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了。

—— Milan Kundera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阅读的年轮:《米兰·昆德拉之轻》及其他 / 韩少功著.

-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04.3

ISBN 7-80195-039-9

I . 阅… II . 韩… III 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2313 号

阅读的年轮:《米兰·昆德拉之轻》及其他

作 者 / 韩少功 著

出 版 /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/ 徐尚定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

邮 政 编 码 / 100037

电 话 / (010) 68992192/3/5/6

电子信箱 / jiuzhoupress@vip.sina.com

总 经 销 /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

经 销 / 各地书店

法律顾问 /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

印 刷 / 三河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 / 10.25

字 数 / 23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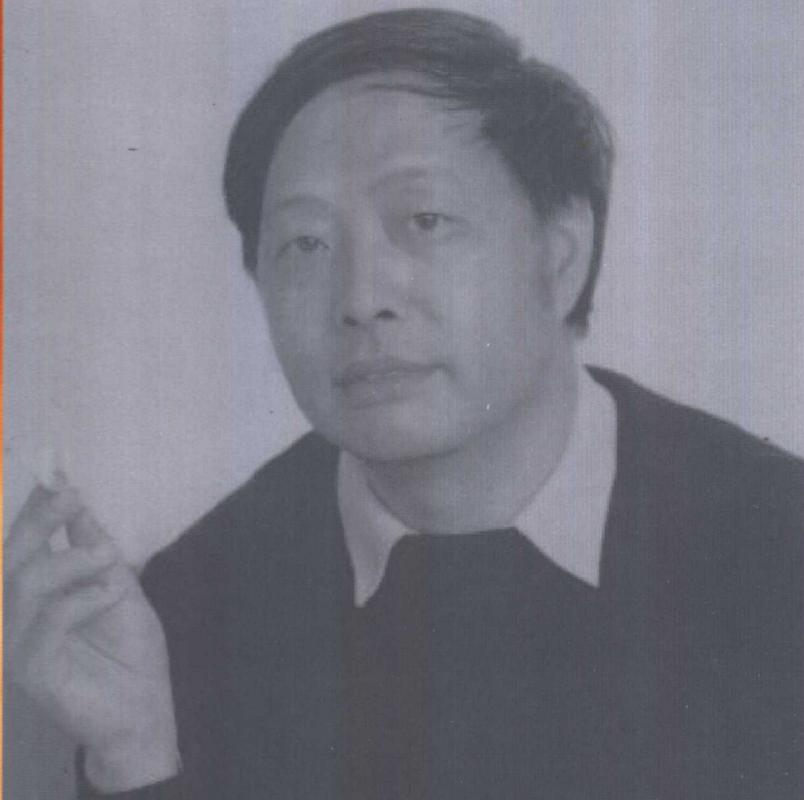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 /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80195-039-9/I · 168

定 价 / 25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★



韩少功，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，汉族，现居海南。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；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；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；1982年后任湖南省《主人翁》杂志编辑、副主编；1985年进修于武汉大学英文系，随后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；1988年迁调海南省，历任《海南纪实》杂志主编（1988）、《天涯》杂志社长（1995）、海南省作协主席（1996）、海南省文联主席（2000）等职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《西望茅草地》、《归去来》等，中篇小说《爸爸爸》、《鞋癖》等，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、《暗示》。另有散文《世界》、《心想》等，译文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（与韩刚合译）、《惶然录》等。部分作品已经被译成法、英、意、荷、日、韩、塞等文字在境外出版。曾获中国内地、台湾地区、法国等文学奖项多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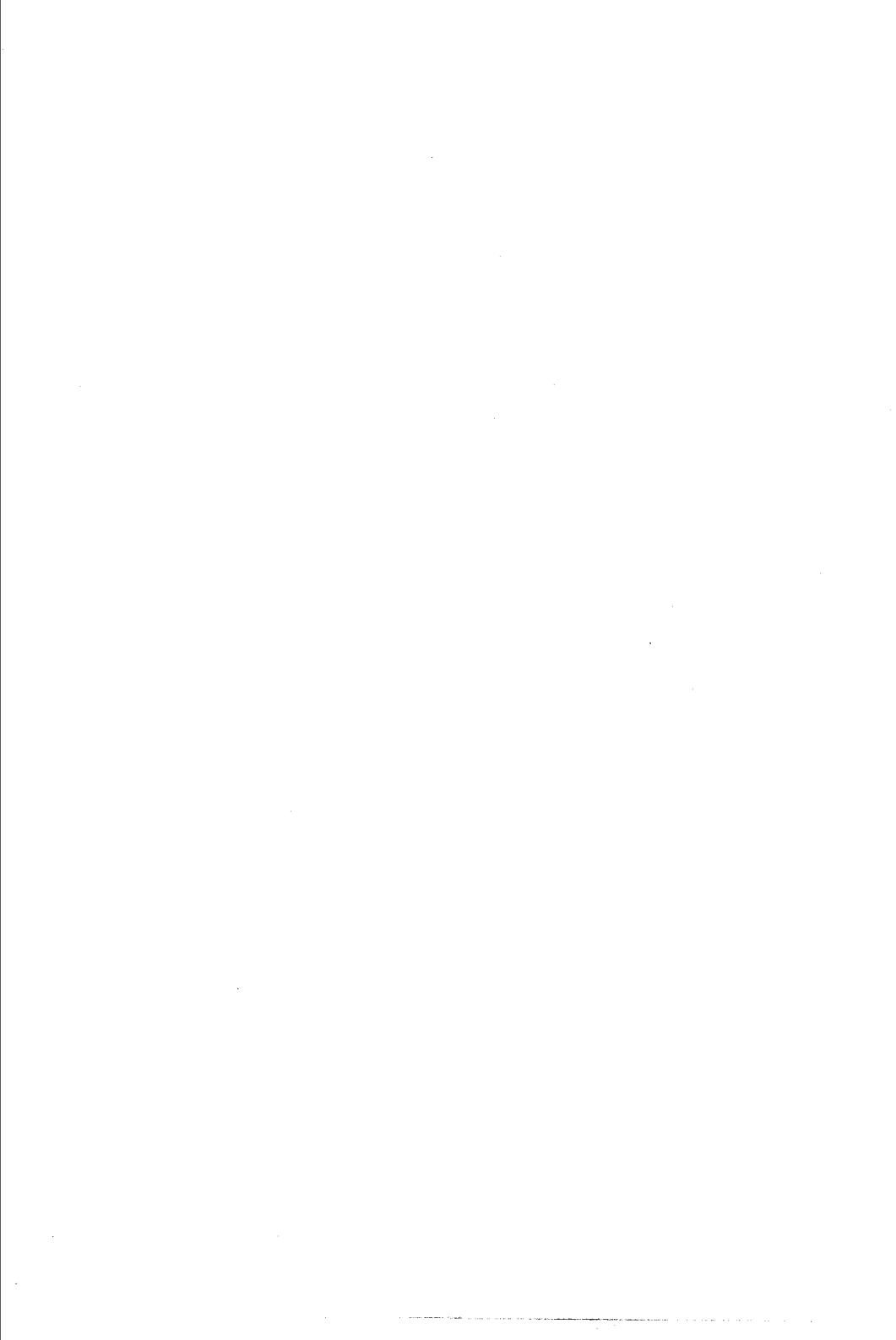
韩少功 阅读的年轮

《米兰·昆德拉之轻》及其他

九州出版社

韩少功

阅读的年轮



岁末扔书（代序）

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今天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书刊哗啦啦冒出来，一个人既没有可能也毫无必要一一遍读。面对茫茫书海，择要而读，择优而读，把有限的时间投于自己特定的求知方向，尽可能增加读书成效，当然就成了一门学问。笼统地说“开卷有益”，如果导向一种见卷即开凡书皆读的理解，必定误人不浅。这种理解出自并不怎么真正读书的外行，大概也没有什么疑义。

在我看来，书至少可以分为四种：

一是可读之书。这些书当然是指好书，是生活经验的认真总结，勃发出思维和感觉的原创力，常常刷新着文化的纪录乃至标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峰。这些书独出心裁，独辟生面，绝不会人云亦云；无论浅易还是艰深，都透出实践的血质和生动性，不会用套话和废话来躲躲闪闪，不会对读者进行大言欺世的概念轰炸和术语倾销。

这些书在专业圈内外的各种读者那里，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，做广读或选读、急读或缓读的不同安排，但它们作为人类心智的燃点和光源，是每个人精神不可或缺的支撑。

二是可翻之书。翻也是一种读法，只是无需过于振作精神，殚思竭虑，有时候一目数行或者数十行亦无不可。一般来说，翻翻而已的书没有多少重要的创识，但收罗和传达了某些不妨了解一下的信息，稀释于文，需要读者快速滤选才有所获。这些信息可使人博闻，增加一些认识世界感受人生的材料；或可使人娱乐，做劳作之余的消遣，起到类如跳舞、看杂技或者玩花弄草的作用。这些书在任何时代都产量极丰，充塞着书店的多数书架，是一些粗活和大路货，是营养有限但也害不了命的口香零食。人们只要没有把零食误当主粮，误作治病的良药，偶有闲时放开一下杂食的胃口，倒也没有坏处。

三是可备之书。这类书不必读甚至不必翻，买回家记下书名或要目以后便可束之高阁。倒不是为了伪作风雅，一心以丰富藏书作自己接待客人的背景。也不是说这些书没有用处，恰恰相反，它们常常是一些颇为重要的工具书或参考资料，有较高的实用价值。之所以把它们列于眼下备而不读甚至不翻的冷僻处，是因为它们一时还用不上，是晴天的雨伞，太平时期的防身格斗术。将来能不能用，也不大说得准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它们不关乎当下的修身之本，只关乎未来的谋生之用。它们的效益对社会来说确定无疑，对个别人来说则只是可能。对它们给予收集和储备，不失为一些有心人未雨绸缪的周到。

最后一种，是可扔之书。读书人都需要正常记忆力，但擅记忆的人一定会擅忘记，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——把一些书扔进垃圾堆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的物化行为而已。不用说，这些书只是

一些文化糟粕，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喋喋不休，即便闲置书架，也是一种戳眼的环境污染，是浪费主人以后时光和精力的隐患。一个有限的脑容量殊可珍贵，应该好好规划好好利用，不能让污七八糟的信息随意侵入和窃据。古人说清心才能治学，虚怀才能求知。及时忘记应该忘记的东西，坚决清除某些无用和无益的伪知识，是心境得以“清”“虚”的必要条件，是保证思维和感觉能够健康发育的空间开拓。

因为“文革”十年的耽搁，我读书不多，算不上够格的读书人。自觉对优秀作品缺乏足够的鉴赏力和理解力，如果说还有点出息，是自己总算还能辨出什么书是必须丢掉的垃圾。一旦嗅出气味不对，立刻调头就走。每到岁末，我总要借打扫卫生的机会，清理出一大堆属于可扔的印刷品，包括某些学术骗子和商业炒家哄抬出来的名作，忙不迭地把它们赶出门去，让我的房间洁净明亮许多。我的经验是，可扔可不扔的书，最好扔；可早扔也可迟扔的书，最好早扔。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我们的时间已经相对锐减，该读的书都读不过来，还有什么闲工夫犹疑他顾？

目 录

第一部分 文中有书

- 文学中的“二律背反” → 读康德 / 13
文学的“根” → 读丹纳、汤因比 / 18
米兰·昆德拉之轻 → 读昆德拉 / 25
灵魂的声音 → 读张承志、史铁生 / 36
无价之人 → 读李叔同、川端康成 / 41
处贫贱易，处富贵难 → 读苏东坡 / 46
圣战与游戏 → 读慧能 / 51
阳台上的遗憾 → 读张潮 / 53
即此即彼 → 读顾炎武、钱钟书、梁实秋 / 57
夜行者梦语 → 读尼采、萨特等 / 62
性而上的迷失 → 读劳伦斯、昆德拉、黑格尔 / 72
在小说的后台 → 读罗兰·巴特、布莱希特 / 87
世界 → 读都德、哈利、亨廷顿 / 93
佛魔一念间 → 读应顺、何士光、熊十力、戴维斯 / 112
完美的假定 → 读格瓦拉、吉拉斯 / 125
第二级历史 → 读杰姆逊、马克思、福山 / 141
熟悉的陌生人 → 读托马斯、福柯、霍夫斯塔特、佩索阿 / 160
国境的这边和那边 → 读德里克、白永瑞、罗素 / 178

- 公因数、临时建筑以及兔子 → 读德里达、哈贝马斯 / 189
人情超级大国 → 读孔子、孟子、培根、董仲舒等 / 196
佩索阿的圣经 → 读佩索阿 / 214
空间 → 读莫里斯 / 218
墨子 → 读墨子 / 222

第二部分 言中有书

- 符号：文化的游击战或者游乐场 / 229
→ 读葛兰西、亚里士多德等
- 语言：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双翼 / 252
→ 读维特根斯坦、刘禾等
- 历史：现在与过去的双向激活 / 279
→ 读程颐、孔子、钱穆、布罗代尔等
- 文学：文体的开放与近观 / 302
→ 读亚里士多德、墨子、杰姆逊、陈村、王安忆等

图书索引 / 325



第一部分

文中有书



文学中的

『二律背反』

康德在他的二律背反面前十分悲观，认为那些命题只暴露了幻想和荒谬，难题永远无法解决。在智者眼里，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中，而相对真理总有局限性，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，一定的条件和前提。因此，人们不应希望一劳永逸，不应希望万能而通用的文学药方。

二律背反——这个词是康德首创的，一般用来表示两个同具真理性的命题的对立。正题与反题针锋相对，但似乎又颠扑不破，于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烦恼，引起永不休止的争执和探索。其实背反就是矛盾，矛盾并不可怕。有矛盾才有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，有矛盾才证明人们的认识还大有可为。

文学创作中是否也有“二律背反”？

作者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——这个命题当然很对。中国早有古训：“文以载道。”文学总是用来表达一定的思想，也可以说是包含一定的理论的吧？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大作家，他们的创作成就正是得益于他们深邃而又精到的理论素养。如果茅盾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学来了阶级分析法，他不可能写出《子夜》。鲁迅如果不接触达尔文和尼采的理论，也不一定写得出《呐喊》和《野草》。那么，当

今的作者不多读理论著作，怎么能掌握科学的世界观？不掌握科学的世界观，又如何能写出黄钟大吕之作？……我对这些论证是诚服的。

慢点，作者无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——这个命题难道就错了吗？中国也早有古训：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文学主要是用形象思维，任何正确的概念，都无法代替或囊括形象本身的丰富内涵，相反，作者的理论框框多了，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缚形象，造成概念化和图解——这是多年来很多作者的教训。在作者政治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，不要提出文学家都成为理论家的苛求吧，给作者的艺术直觉留下地盘吧。曹雪芹并没有剖析封建集权社会的高深理论，也写出了理论家所写不出的《红楼梦》。历史中不也有很多不懂理论的诗人和作家吗？对理论的疏远，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里充满着生活的丰富性、形象的光泽，还有创作的“灵气”，并不妨碍他们留下穿越时空的杰作。

作者必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——这个命题的真理性显而易见。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，当然应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。传说古代白居易的诗能传诵于妇童之口，遍题于寺观驿站之壁，还传说柳永的词也颇能深入群众，“凡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”。当代更不用说了，天安门革命诗歌不胫而走，蒋子龙的《乔光朴》几乎家喻户晓，这岂是钻进“象牙塔”的结果？这个传统不应努力继承吗？……我对此深以为然，所以对大多数读者可能不太关心的主题，对他们可能不太习惯的手法，常常抱着谨慎的态度。

慢点，作者无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——这个命题就完全荒诞不经吗？少数读者也是人民的一部分，而且“大多数”究竟是置于什么范围而言？湖南花鼓戏的观众，在全国来说算不上什么多数。儿童文学也不能引起“大多数”青壮年的兴趣。思想艺术价值也从来不能依作品的读者多寡来定。《红楼梦》的读者就比《七侠五义》的读者少，也比电影《三笑》的观众少。王蒙和高晓声的作品，也不